

中国不结盟、全方位 和平外交的确立与实施

□文/宫力*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逐步走出越战阴影，美苏角逐的战略态势出现了新的变化，长期紧张的中苏关系也出现了缓解的迹象，一方面使中国方面在外交上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也使邓小平感到，中国作为国际格局中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块头大，分量重，如果加在美苏任何一方，都会使国际战略力量失去平衡，而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而且对中国也不利。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做出新的战略决断，及时改变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与美国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不打牌的政策。而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有所调整。因此，从1982年下半年起，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在

对外方针方面不再公开提及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实质是结成最广泛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不支持任何一方去反对另外一方，更加强调发展同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关系。

一、结束中国外交结盟的历史

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来中国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并详尽地阐明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他说：“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这样，美国就不再被列入反霸统一战线之内，相反，邓小平还恢复了对美国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批评，并强调第三世界的作用。他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为什么现在我特别强调第三世界这一点，因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对第三世界有特殊意义。霸权主义的受害者是谁？难道是美国、苏联？美国和苏联是搞霸权主义的，他们不是受害者。欧洲、日本、大洋洲、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不是受害者。东欧有一点受害。如果世界和平被破坏，首先受害的是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际上没有什么和平，大战没有打，但小战不断。小战在哪里打？在第三世界。根源还不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在那里挑拨，在那里插手！长期以来，超级大国就是利用第三世界的冲突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尽管第三世界本身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直接受害的还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这就决定了有切身利益的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是真正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这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由第三世界所处的地位和切身利益关系决定的。”¹

此后，中国在同苏联举行副外长级磋商的同时，声称不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结盟。1982年8月22日，中国外长黄华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时说，“中国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会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不会打‘苏联牌’去对付美，也决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²考虑到当时中苏关系尚未正常化，这里所说的“中国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主要是指美国而言。

随后，在1982年9月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大会上，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指出了中国外交调整的方向。他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这后一段话显然是针对前一段的中美关系有感而发。邓小平进而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从而表现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生活方式的警惕。他说：

“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最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在提出党和国家在80年代的主要任务时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³由此点明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根本目标是为国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变使中国突出了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特色，成功地在美苏争霸两极格局下采取了一种相对超脱的姿态，由此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416页。

2. 《人民日报》，1982年8月23日。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拓展了自己的外交空间，增强了自身的外交地位，增加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此后中国的对外战略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可以说，这是中国对外战略最具深远意义、最为成功的一次转变。

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要否定中国外交以前结盟的历史。因为，不同时期的不同战略选择有其不同的国际条件和历史背景。而要真正实行不结盟、不打牌、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的全方位外交，至少需要有以下四点必备的条件：首先，具有维护自身安全利益所必备的实力。其次，是国际社会和平的力量超过战争的力量。第三，摆脱冷战思维的束缚，以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来观察和面对世界。最后还有一个洞察机遇和把握机遇问题。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不仅具备这几项条件，而且不失时机地把握住了历史机遇，成功实现了中国的对外战略的这一转变。邓小平在总结这一历史性的战略调整时说：“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世界上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分量的。我们奉行独立

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也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个我们说到做到。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他认为“只要坚持这样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¹ 这对于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深远的战略意义。

二、探索中美关系的新路径

在中国与美国拉开一定距离之后，邓小平仍然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待中美关系。虽然此时中美关系的基础已不再是共同对付苏联，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也有尖锐的矛盾，但邓小平认为，中美关系在维护世界稳定，发展两国经济以及其他许多领域的合作仍有巨大的空间。因此，在中美关系处在困难的时刻，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为使中美关系回到正确的轨道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与美方进行了一番意志的较量和磨合，并相继采取了一些恰当的措施，稳定了中美关系的大局。

1982年12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时指出：“我是主张中美交朋友的，这是从战略观点出发的。尽管美方搞了许多小动作，但我们的这个方针和立场没有改变。两国关系正如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时所说的，合乎两国自身利益。这是一个基本的观点。维护和发展这种用十年时间建立的关系，关键是要互相信任。如果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28页。

出现一些造成彼此不信任的事情，那就很难了。”¹

面对中美苏关系的微妙变化，美国一方面对中苏磋商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对中国恢复对美国搞霸权主义的批评感到不满。因此，自1982年下半年黑格国务卿辞职后，美国也开始考虑调整其对华政策，其侧重点是要把“中美关系放在更现实的基础上”。在经过了一番酝酿准备之后，美国新任国务卿舒尔茨于1983年2月访问中国，探索发展中美关系的新的途径，并力图在中苏磋商过程中起到某种牵制作用。

1983年2月5日，邓小平会见了舒尔茨，并与他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在谈到两国信任问题时，他指出：“我们深感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人事变迁对美国政策的连贯性有很大影响。我们两国之间现在的问题是重新认识，是怎样才能建立相互信任关系的问题。中美关系要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相互信任。”²

在谈到中美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时，邓小平认为：“《与台湾关系法》是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如不改变此法，中美关系恐怕很难有明显的、满意的发展。我们希望美国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能够做朋友，建立比较长期相互信任的关系。”³

舒尔茨的这次访问并不成功。虽然舒尔茨在会谈中说，美国政府和里根总统对于发展中美关系十分关注，他们充分准备信守1982年8月17日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的一切条款。但实际上，美国并没有迈出实质性的步伐。美国不仅没有严格恪守中美建交公报的规定，一些官方人士还对公

报作了歪曲的解释，美国高级官员还出席台湾当局在美机构举行的伪“国庆”招待会，美国政府批准台湾“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在波士顿增设办事处，美国提出的售台武器的限额也大大超过了美国政府部门自己公布的最高年度额。在会谈中，舒尔茨认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符合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的。中国方面认为，《与台湾关系法》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应予废除。双方立场的分歧显然较大。

此时，针对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邓小平就正确处理对美、对苏关系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明确提出在外交工作中要坚决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方针。对待任何国际问题，都应从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确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他强调，对于美苏两国的霸权主义，我们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他们之间的矛盾可以利用，但不是配合这一霸反对另一霸，也不是在两霸中搞平衡，搞等距离。”⁴

此后，在邓小平战略指导下实施的中国的对外政策更加成熟。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⁵ 由此展开的中美苏关系越来越走向不针对第三国的、正常的国家关系。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7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页。

4. 转引自高屹：《邓小平新时期的外交战略思想述论》，载王泰平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3页。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57页。

三、在和平外交的理念下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在和平外交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对外部事物的看法和对外工作的重心也逐渐发生变化。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会见了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详尽地阐述了中国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和中国的对外政策的变化。他说:“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一点,我们两国的观点一致。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我们在制定国内搞建设这个方针的同时,调整了对外政策。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有利于和平。我们不打别人的牌,就是说不打苏联的牌,也不打美国的牌。我们也不让别人打我们的牌。我们在分析国际状况时特别注意欧洲,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地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们同东欧关系不正常。现在我们根据客观的判断,认为西欧和东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东欧、西欧都需要发展,越发展和平力量越大。为什么说欧洲是和平力量呢?因为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只有两个超级

大国才有资格发动。而战争一旦打起来,首先受害的将是欧洲。我们希望有一个联合、强大、发展的欧洲。只要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下班,战争就打不起来。所以,我们说,争取比较长一点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我们感觉比较开放一些,特别是技术上开放,我们比较满意,当然不是完全满意。所以我们确定的政策是同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这不仅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对荷兰,对整个欧洲共同体的政策都是一样的。我们同东欧也在发展关系,这是我们的新方针。”¹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今后,我们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正确选择进出口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进一步扩展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交流,为加快我国科技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更好的条件。”²

1988年6月22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形势逼人,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³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88年12月24日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对外工作。并根据新时期的历史任务,强调要把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摆到对外工作更重要的地位。会议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总的来说对我国是有利的。我国有可能争取到一个长期稳定的国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234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7、23页。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69页。

际环境，以集中力量搞好改革和四化建设；各国改革和调整的潮流也为我国积极开展外交、扩大对外经济联系，进行互利合作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天地。会议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已取得了明显成效。实践证明，我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正确的，今后应继续贯彻执行。同时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我们应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加以发展和丰富。我们要积极推动国际形势朝着长期缓和的方向发展，继续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倡导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大力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政治关系、经贸关系、科技合作、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我们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并把加强国际经济、科技合作摆到对外工作的更加重要地位。¹

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判断所提出的中国对外工作的新思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正确地指明了在新形势下的中国对外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抓住机遇，为国内方兴未艾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各国发展政治关系、经贸关系、科技合作、交流和民间往来，都是围绕这一中心而展开的。而为实现这一目标，加强对外经济、科技合作不能不在中国对外工作中占据愈来愈重要的位置。

四、中苏关系正常化

与发展中美关系相平衡，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也取得了重要进展。由

于苏联在克服中方提出的三大障碍的问题上逐渐采取积极的态度，同中国达成了谅解，从而为中苏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条件。在此背景下，应中国的邀请，1989年5月15—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从而使中国在中苏关系三角关系中的地位获得较大的改善。

对此次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接待礼仪，邓小平要求在安排上讲究适度，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这言简意赅的六个字，表达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礼仪问题，而是准确地概括了当时中苏关系的性质，形象地勾勒出两国关系未来的定位。至于双方会晤的主题，邓小平提出思想深邃、语言明晰的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²

5月16日，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由此标志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完成。邓小平说：“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

邓小平从回顾中苏关系的历史讲起，他说：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邓小平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谈过去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但是，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我讲讲中国人、中国党的一些看法。对这些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更加扎实的基础

1. 《人民日报》，1988年12月25日。

2. 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上前进。

邓小平说：我只想简单讲两点。一是讲讲历史上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二是讲讲近几十年，确切地说是近三十年，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

先谈第一个问题。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比英国更早，强租中国领土澳门的，是葡萄牙。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也包括苏联。日本占了中国不少地方，台湾就被它占了五十年。中国有很多地方被日本划为它的势力范围，特别是在北方，很多大城市有日本租界。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一九三二年在中国的东北搞了个“满洲国”。一九三七年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打了八年。最后，由于中国抗战，由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国家的共同战斗，包括苏联出兵，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彻底失败了。日本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所以，算历史帐，日本欠中国的帐是最多的。但是由于日本战败，中国收复了所有被它侵占的地方，它在中国没有占去一寸土地。悬案是一个钓鱼岛，

那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上面没有人烟。我访问日本时，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可以挂起来，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下一代会比我们聪明一些，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对于这个问题以及同类的纠纷，后来我们提出了一种设想，就是可否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加以解决。另一个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后延续到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一九二九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同苏联签订了新约。中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达成了协议，划定了边界。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这是讲的第一个问题。讲清这个问题可能对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对弄清“开辟未来”的某些概念有好处，所以值得讲一讲。

第二个问题，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中国的革命战争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不侵略别人，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却受到外国的威胁。中国是个贫弱国家，但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何方？从建国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那时威胁来自美国，最突


出的就是朝鲜战争，后来还有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中国出了志愿军，同美国直接较量，苏联供给的军火还要中国付半价。后来中苏两国关系不好了，中国面临经济困难，但无论怎样困难，也得还这笔军火债，我们提前两年还清了。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虽然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

在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中苏关系的历史后，邓小平说，我讲这么长，叫“结束过去”。目的是使苏联同志们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帐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现在两国交往多起来了，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交往，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大的发展。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

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这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参与。¹

对此，戈尔巴乔夫表示，在不太久远的过去，在苏中关系的有些方面，苏联有一定的过错和责任，并赞同讲过去就到此为止。²

邓小平所强调的开辟未来，是指在中苏关系正常化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间关系，明确今后中苏新型关系的具体内涵和应当遵循的准则。他总结了十几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由此得出了重要的结论，那就是无论是结盟，还是对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苏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正因如此，中苏最高级结束后，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指出，中苏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的利益。这样就形成了既不同于50年代的那种结盟关系，更不同六七十年代那种对抗性的状态，而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正常的国家关系³。

中苏关系正常化不仅使中国结束了与最大的邻国之间长达几十年来的关系不正常状态，改善了中国的周边安全，而且也使中国外交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增强了中国在对美外交中的地位。当时，中国正面临着一场政治风波，不久，美国开始对华制裁。在此之后，国际形势逆转，苏东巨变。但苏联解体后的中俄关系经受住了考验，这对于处于困难时期的中国外交来说具有一种重要的战略意义。

（责任编辑：孙东方）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91—295页。

2. 钱其琛：《结束过去 开辟未来：回忆邓小平同志关于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决策》，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五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2页。

3. 钱其琛：《结束过去 开辟未来：回忆邓小平同志关于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决策》，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五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